



《紅岩》與我

—— 我的編涯甘苦

張羽 著 鐵鳳整理

紅岩

《红岩》与我

——我的编涯甘苦

张羽著（铁风整理）

目 录

代序(一)	邵燕祥(1)
代序(二)	黄 伊(5)
代序(三)	王梦岩(10)
引言	(14)
一 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到《在烈火中永生》	(17)
二 《红岩》母本——《锢禁的世界》	(22)
三 二编室约稿	(30)
四 接受责任编辑任务	(35)
五 《红岩》第一稿诞生	(59)
六 集思广益,修改定稿	(70)
七 《红岩》出版后	(81)
八 《红岩》第一篇介绍文章	(85)
九 《红岩》修改的真实记录	(90)
十 为什么让我担任《红岩》责任编辑	(95)
既当作者又当编者,既编创作稿又编翻译稿	(95)
选编《中国新诗选》	(98)
发现作家梁斌及其小说《红旗谱》	(100)
为青年作者开拓园地	(108)
创办《红旗飘飘》	(110)
加工整理《王若飞在狱中》	(124)
我的生活阅历	(144)
为出版《风满潇湘》铺路	(149)
为出版《风雷》尽力	(156)
《焦裕禄在兰考》及其它	(161)
我对文学编辑工作的体会	(162)
十一 “文革”中《红岩》作者和编者的命运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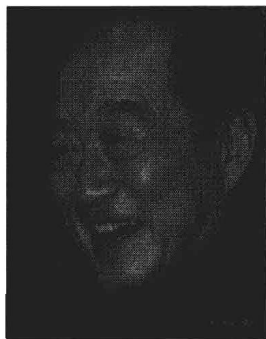
十二	戏剧性的一幕	(179)
十三	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182)
十四	丑剧尚未闭幕	(186)
十五	《恽代英传》的苦难历程	(205)
	尾声：无名氏的甘苦	(221)
	整理者后记	铁 风(223)
	附录一：张羽生平年表	(227)
	附录二：张羽编书目录	(230)
	附录三：张羽著述目录	(236)
	附录四：（为洗涮冤情、为恢复党籍）张羽申诉书目录	(246)

代序（一） 一生激情的记录

——为《张羽文存》作序

邵燕祥

铁凤持来张羽兄“文存”的校样，于她，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是保存亲人的遗稿，如同手里捏着一团火；于我，则从这里看到了这位兄长激情的一生。19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张羽诞生在豫西的农村，抗战开始，这个热血少年立即投身抗日救亡斗争，虽然要求上前线未果，他于1938年2月22日入党，走上无形中的前线——同样是充满艰险，随时准备牺牲。从此，他的命运就始终与



邵燕祥（纪红 摄）

党相联系，无论顺境逆境都分不开。1949年前，他先后在河南和上海的学校、工厂从事秘密活动，同时给上海报刊写稿子，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1953年，他由上海调往北京，长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他自己采写的，编辑的，参与主持出版的许多图书，大部分都是宣传革命者特别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不怕牺牲的事迹和精神，却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列为他的罪状。从党内到党外，在不可思议的政治图谋下，革命烈士被诬陷为叛徒，张羽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罪人，遭到残酷斗争，肱骨也被打断。他写的申诉材料累计达十余万字，直到1989年才彻底平反。进入90年代，他以古稀之年，病残之身，终于在夫人铁凤的帮助下，完成了准备达三四十年的《恽代英传》的写作。

面对张羽的文字，回顾他的一生，不禁想起一句“故人生死各千秋”，这正是恽代英当年追悼李求实烈士的诗句。张羽的大半生，也

是与恽代英的名字分不开的。他在受到无情打击又患重病的年月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家庭离散,个人的生死浮沉,而是他还没有把有关恽代英的采访笔记整理出来,更还没把烈士的传记写出来,而知情人都已凋零,烈士精神所寄寓的诸多历史细节,面临着湮灭的危险。所幸的是,在他的晚年,不但应温济泽之邀参加了大型书系《革命烈士传》的组织、编辑工作,担任其中两卷的主编,而且在1995年亲见《恽代英传》的面世。

张羽对得起他所立传的许多位烈士,对得起他曾采写报道过的许多位革命年代中又平凡又卓越的普通人,这些都是民族的脊梁,不管政治层面的风云怎样变化,意识形态怎样趋于多元,一个民族在历史重压下所迸发的争自由争解放的精神,凝聚为一个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格,形成了必须珍视和传承的遗产。

在这个意义上,张羽对得起历史,无愧于一个历史年代委托的重任。因为张羽留下的所有传记性遗作(《恽代英传》因篇幅关系,只收入传记的缩编本),因其探隐抉微,翔实严谨,便都具有了历史文献性的价值。“文存”上册中的全部文字,以及下册中有一些纪实性的篇章,便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作品,与其像过去经常说的,可以用于对青少年的教育,毋宁说更应该作为成年人的教材,首先是对目前各级党政干部检验和考核的镜鉴。

张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惜以他的全部生命去为理想奋斗的血性之人。他如同他的同代人一样,受到时代的、思想的某些局限,这是后来的读者能够理解的。因此,在历史面前,张羽可以无憾矣。当然,张羽作为一位十分自觉地对历史负责的人,至死还有他放心不下的事情,我们后死者也可以告慰他说,大到一个民族、一个重大事件,小到一单位乃至一本书的历史,都不是什么人(更不是历史的丑角)所能任意转弄的,历史终会还其本来面目。

面对这一部千页大书,请容许我说些题外的话。我跟张羽同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相识,但我那时是青年读者,读过他采写的《王孝和》,读过他作为责任编辑帮助作者完成的小说《红岩》,读过他创意并与萧也牧(吴小武)一起策划,与黄伊、王扶一起编辑的多卷

《红旗飘飘》丛书,这是一串长长的书目。这些读物,还有《刘胡兰小传》、《把一切献给党》等,是共和国最早的一批传记文学作品。今天六七十岁的读者,大概还能记起上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时,全都读过这些中国作者写的书,还有国外的主要是苏联青少年读物中的英雄传记,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古丽亚的道路》等,可以说,这些对一代人的成长影响至巨。

苏联的图书姑且不说,这些中国作者写的书,自然都是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难以想像的是,这些作品的发表也并不都是顺利的。就如《爱与死的搏斗》一文,是张羽 1962 年受《红旗飘飘》编辑部负责人陈碧方委托,到上海采访卢涛(卢志英)烈士的夫人张育民,连谈七天七夜后整理的口述记录,却直到文革后的 1988 年才得以发表。这是怎么一回事?据张羽的后记说,《记卢涛》写成后,原刊于《红旗飘飘》第 17 集。不意,因书中有王朝北一文,康生制造了一个“王朝北反革命案”,这一集遂全部销毁,《记卢涛》也遭受池鱼之殃。陈碧方在一场内外夹攻之后,愤而离开。文革中,张羽本人和他编的《红岩》、《王若飞在狱中》、《在烈火中永生》以及他写的《王孝和》等均遭诬陷;卢涛当时也被诬为叛徒,建在雨花台上的烈士碑被砸毁了,《记卢涛》成为张羽又一“罪证”,受到大会小会的批判。文革结束后,《红旗飘飘》复刊,但因文革余毒犹存,尽管王朝北的文章得以发表,而张羽此文还受到排斥。1979 年,卢涛夫人张育民在病床上口述了补充材料,由儿子大容记录,但来不及亲交给张羽,就去世了。1988 年,在卢涛英勇就义 40 周年时,张羽根据上述补充材料对原文作了订正,改为现题,正式发表,作为“对卢涛夫妇的共同纪念,同时也为那个可诅咒的年代留下一页记录”,“痛心的是,虽然 1988 年此文卢大容读到了,但是我的长篇仍未见到,而卢大容也去世了……”张羽在这里对张育民和卢大容母子所怀的感情,更不必说他对卢涛的感情,绝不是一般记者与采访对象、报道对象的关系可比,这是一种呼吸相通、患难与共的同志情谊,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中已经少见。

在本书下册各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张羽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

程。这个肝胆照人,有侠义风,却因胸无城府,不存戒心,在勇于内斗者的迫害下命途坎坷的汉子身上,同样折射了中国一个漫长时期的历史。我仿佛仍是在张羽东四十二条宿舍的书桌前,听他的倾诉、指点、鼓励。在这部“文存”里,他告诉我们的远较他日常的谈话更多,更系统,也更深入细致,而激情和理想始终闪耀其间。

2005 年 10 月 17 日

代序（二） 精品献读者

——张羽同志的编、写生涯

黄伊

5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张大办公桌，比两张普通办公桌合起来还要大，桌面是吕宋木的，十分漂亮。这张桌子，是“开明”与“青年”合并时由上海运到北京的。我猜可能原来是经理用的，不知为什么归我们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使用了。此桌最先由张羽和作家萧也牧合用，后来由张羽和我对面而坐。张羽的许多事情我亲眼目睹。此桌也经历了中青社二编室最为兴盛的一段时期，好比《红楼梦》里那块顽石一样。本文所写的许多事，都或多或少与此桌有关。



黄伊

为大批青年作家开辟园地

50年代中期，中华大地涌现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团中央、全总和作家协会，决定联合召开“全国首届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张羽因工作需要，被派去参加筹备工作。这次大会的具体工作，由马烽和公木负责。萧也牧和马烽是“哥们儿”，所以萧也牧陪着



张羽和他的大办公桌

张羽到文学讲习所去拜访了马烽和公木。会谈一锤定音，由作家协会编选10册《青年文学创作选集》，交由中青社在青年作家大会前后出版，由张羽作责任编辑。张羽在大会期间，又展开了广泛的活动，组织了大批青年作家的书稿。当时最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王蒙、刘绍棠、李準、浩然、邓友梅、陆柱国、史超、从维熙、林斤澜、高缨、彭荆风、韶华、玛拉沁夫、王愿坚、胡万春……青年诗人流沙河、公刘、邵燕祥、白桦、梁上泉、雁翼、李瑛、韩笑、未央……他们最优秀的作品，不是被收进选集、合集，就是用单行本的形式在中青社出版了。今年夏天，我在成都见到作家高缨，他对我说：“现在还活跃在文学界的60多岁的作家，大都是参加过那次青年作家大会的。青年出版社当时为我们这批作家的涌现，作了多少推波助澜的工作啊！”

大办公桌可以作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羽陆续编发了三四十本青年作家、青年诗人的创作集。当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送到这张大办公桌上时，张羽的脸上多次绽开了喜悦之花。

与此同时，张羽编发了老诗人臧克家编的《中国新诗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更为可喜的是，他和萧也牧从文学讲习所抱回了一大包《红旗谱》的原稿。张羽负责初审，肯定了这部作品，并提出和作者梁斌签订约稿合同。这预示着一部伟大的作品将要诞生了。

全国第一份革命回忆录丛刊

二编室为了加强传记文学的出版，成立了传记组，由张羽负责。组员有笔者，还有刚从学校出来的王扶（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三人经过紧张的努力，组织到一批稿子。分头审读后，我认为这些稿子要作为单行本出版分量还不够，张羽遂说：“邹韬奋和郭老、夏衍他们当年搞抗日宣传和民主运动时，有了稿子就出丛书。我们不是可以出丛刊吗？”王扶连忙去把主管我们传记组的萧也牧请来。萧也牧一听，欣然同意。于是大家一起想刊名。因为当时萧也牧正在写一篇小说《鱼船儿飘飘》，我很欣赏“飘飘”两字。大家又围绕飘飘什么讨论了好久，最后一致同意叫《红旗飘飘》。说干就干，

上午开完会,下午张羽就给社领导写报告。也牧在那张大办公桌上修改、抄正以后,亲自送给社长朱语今。社长签字同意后,丛刊就办起来了。

《红旗飘飘》在张羽的主持下,从1957年5月开始,半年多时间,连续出版了6期。该刊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用昂扬的革命精神,教育和鼓舞全国青年读者。在建军30周年前夕,我们和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联系,编辑了一批高质量的革命回忆录(即第三集);在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我们和中苏友协总会,共同编辑成一集专门反映在俄国的10万华工参加十月革命的珍贵史料(即第四集),该刊因而大受读者欢迎。全国二三十家大报刊、大广播电台,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纷纷转载、选播《红旗飘飘》上发表的文章。他们还发表关于该刊的出版讯息、通讯、评论和报道。50年代全国第一家刊发革命回忆录的专刊,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

编发了三本闻名遐迩的革命回忆录

《红旗飘飘》正在红红火火,1957年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青社残破的四合院。张羽虽然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却实际上被撤销了《红旗飘飘》负责人的职务,和我一起被调到第五编辑室(社科编辑室)坐冷板凳。王扶被调到少儿社,只剩下《红旗飘飘》创刊一两期以后才来的青年编辑、我的老友南新宙。我不久又回到二编室,又坐在那张大办公桌旁办公时,看不到张羽。我耐不住寂寞,满世界去抓《烈火金钢》、《创业史》、《红日》、《高玉宝》等书稿。但是,每当我回到大办公桌旁,沏上一杯三级花茶,又在想,我的难兄难弟张羽现在怎么样了?

张羽也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人家本来要他坐冷板凳,他却风风火火地大干起来。他带着在那张大办公桌上制订好的组稿计划,又出了3部中篇革命回忆录。中青社的名声,随着张羽发的这几部书稿,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又轰动起来。

一部是蒋秦峰写的《在毛主席周围》。此书是在毛主席健在时首次出版的。它生动、具体地写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和性格。作者从主席身边警卫人员的角度,写撤出延安时主席的活动。事件真实,语言生动,富有主席的语言特色。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革命回忆录。

一部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在烈火中永生》。该稿是王扶在《红旗飘飘》时根据重庆读者赵山林的推荐,写信向罗广斌约的。短篇回忆录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反应强烈。张羽编辑单行本时又向作者发函,要求作者扩大篇幅,把事件展开。新稿很快寄来,由张羽定稿出版,同时在《北京晚报》连载。晚报在北京极有影响,一文既出,誉满京华。该书发行高达328万册。

一部是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的《王若飞在狱中》。该稿系笔者在《红旗飘飘》时所约。约稿时并不知道杨植霖是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交稿后发现作者将它写成思想修养类的文章。有人主张退稿。当把稿件拿给张羽时,他详细看完全稿后,发现有许多极其珍贵的材料,可惜作者未做很好的发掘和发挥。张羽打乱全稿,列出抓住主线向纵深发展的提纲,送交社长审阅,建议当作重点稿,大力来抓。社长批准后,张羽又带上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弟弟王景任的材料,亲赴内蒙古,为杨植霖重新整理该稿。薄一波的那篇,系张羽到北戴河采访薄一波写成的。《王若飞在狱中》三篇回忆录,出版前分别在许多大报刊上发表。该书甫经出版,即不胫而走,成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民克服困难的精神武器。该书印行362.9万册,为回忆录之冠。

将《红岩》推到万千读者面前

《在烈火中永生》正在红火的时候,萧也牧以“待罪之身”(萧被错划成右派),用二编室名义,写了一封信给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后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将《禁锢的世界》(《红岩》的原名)寄来了。谁当这部小说的责编呢?张羽那时还在五编室,他担

任过《在烈火中永生》和《王若飞在狱中》的责编，他还写过以狱中斗争为题材的《王孝和》。《禁锢的世界》这一出大戏不请张羽来唱还请谁？天下分久必合，他又回到二编室，在那张大办公桌和我相对而坐，开始审阅《红岩》初稿。

《禁锢的世界》有过两次打印稿。张羽逐一认真审读后，认为作家的眼界要放得开一些，不能坐在集中营里写集中营，要解放思想。不能光是写中美合作所敌人对革命志士的迫害，要写他们的斗争，写狱中斗争有全国形势的配合……作者后来到了北京，张羽陪他们征求意见，打开思路，明确修改重点。秋天，作者又将稿子带到北京，住在出版社临时给他们安排的房子里重写。到了小说定稿、发排最紧张的阶段，张羽干脆离开办公室，搬到那里跟他们一起住。三人三床三桌，日夜兼程，一起修改稿子。这就是后来震动文坛和读者界的《红岩》。该书前后印了700多万册。

他还在大办公桌旁勤奋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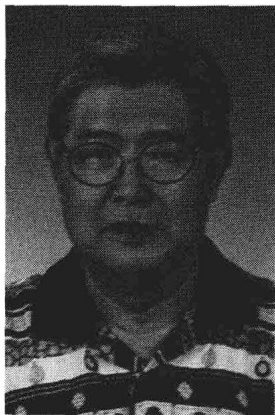
这张经历了中青社最兴旺发达时期的大办公桌，若干年后由行政科处理旧家具时，张羽怀着对故友的感情，花了12元买了它，放在他的书房里。他在这张大桌子上，继续辛勤耕耘。萧也牧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张羽和我为我们亲密的伙伴，新中国第一个受错误批判的作家编了《萧也牧作品选》，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后来，张羽又以崇敬的感情，写了《萧也牧之死》，对正派的小说家、严谨的编辑家萧也牧遭受的磨难，作了真实的记录，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现在，为迎接明年恽代英诞生100周年，他正在写一部反映恽代英烈士光辉一生的《恽代英传》。我在那张大桌上看见一堆堆稿子。愿他能早日完成他早在50年代就作为一个有心人收集、采访、整理材料，经过几十年间的酝酿构思而完成的著作！

（原载《北京日报》1994年11月5日第七版）

代序（三）

我所知道的张羽同志

王梦岩



我和张羽的相识相交从建国初期（1953年）就开始了。随着我所在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以下简称二编室）的工作交往增多，我们的友谊也日益加深。我想就若干方面，分别写出张羽同志的方方面面。

一、帮我改稿

王梦岩

《红旗飘飘》创刊号上登载了我的一篇文章《女红军张吉兰》，初稿是他约我写的。他一共改过两次，我均很满意。最后发排前他和我一起又逐字逐句推敲了一遍，并改了题目。原题似叫《永远难忘的人》。他说，不如就叫《女红军张吉兰》更好，征求我的意见。他很谦虚、客气，我当然同意，因为它更响亮，直抒文意。

我还有一个四五万字的中篇革命故事集《刘志丹在乔山》，在陕西《延河》上发表，陕西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羽同志多次修改，后来因故没在中青社出版。张羽这次为我改稿是我终生难忘的。这本小册子共十几个故事组成。他把改后的稿给我看时，我惊呆了。他用红笔改的，有的地方等于他重写；有的地方结构前后作了较大的调整；作了辞藻文句的润色；甚至有的标点符号也作了改动。全文经他修改后观之，稿件的质量显然得到了很大提高。我是个做文学编辑的，

也帮助作者改稿,特别是长篇稿件的修改,是要费时费力的。从张羽同志帮我改这两篇稿子看,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从此更增加了我们的友情。

二、编辑工作认真负责,体现其文学水平之高

我们解放军文艺丛书每年都要给中青社发若干稿件(中、长篇、短篇都有)。中青社二编室发稿前由主管责编来我丛书编辑部(或我们去中青社)谈书稿意见。有时是张羽谈,有时是萧也牧谈。江晓天、黄伊等也同时参加。有的书稿意见多达200多条。张羽同志谈书稿意见,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重大的历史事实有误,须改正。例如抗日战争时的书稿,常出现“敌友我”和“敌伪顽”等的描写,但有时作者常常搞错。东北地区的伪满州国士兵和南京方面的汪精卫士兵是不完全一样的,对国民党称“顽”,对日本军队称“敌”。有的稿件中很不统一,很不清楚。这就需要在—部稿中统一,前后不能出现矛盾。再有政治用语、人名、地区、世界范围的地域、国名等等,也都须准确。稿中常出现错误。张羽同志均能—提出之。

2. 当然更主要的是文学方面的。因为要出版的是文学作品,所以,张羽同志谈稿的重点也在这方面。如一部长篇小说,有的章节重复需删节;有的尚感不足,需增补一些情节。为了提高作品质量,使作品结构更严谨,张羽同志都能提出很细致的修改意见。张羽同志在谈意见时,常常把自己积累的故事情节说出来,供作者修改作品时参考。甚至他说,如果作者觉得这个故事情节好,可以写进作品中去,算是我一点奉献——一个编辑的奉献。在我们编辑队伍中,像张羽同志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可惜因为时间久远,我的资料、笔记、日记等都在前几年装修房屋时遗失,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张羽谈稿的具体细节了。)关于人物塑造方面,这是一部作品非常重要的问题,张羽同志谈稿十分注重。他常提出如何把人物塑造得更丰满、形象更鲜明,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要树立起来,能把一部作品撑起

来。人物塑造好了,作品才能站得住。他是很健谈的,由此,他可以列举世界著名家的作品如何在塑造人物方面下工夫。他讲过托尔斯泰的《复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母亲》、法国巴尔扎克的《巴黎圣母院》、英国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的人物等等。据我所知,中青社“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之一《红岩》的责编是张羽。他倾注的心血是人所共知的,而不是王维玲。从初稿到《红岩》在国内、国外有那样大的影响,影响几代人的成长,特别是我国青少年的成长,张羽同志功不可没。至于有的具体材料,我就不追叙了,中青社二编室的老人了解。记得他还是《在烈火中永生》、《王若飞在狱中》的责任编辑。他和黄伊在他还背着“叛徒”帽子的情况下,编辑出版了《萧也牧作品选》。这可以看出他为人之伟岸、无私、对于友人之无限感情。“文革”以后,张羽再也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但是直到1990年,年近古稀的他还主动请缨,编辑出版了《红旗飘飘》31集(纪念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70周年专辑),这可以看出一个老编辑、老共产党员的工作责任心,对党的事业的崇高使命感。我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央编的《革命烈士传》出版活动会议,张羽是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也参加了会议)时,张羽同志亲手送给我的。我在这期刊物读后,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如下的话:“老友张羽赠于1991年7月5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革命烈士传》十卷版新闻发布会上,读后甚喜。新材料很多,妥为保存,以资纪念。”

我有过一套《青年文学创作选》十卷本,这套书很受欢迎,社会反响很大,特别是对青少年影响巨大。它是张羽同志所编。

三、张羽同志的作风

我从事编辑几十年,清正廉洁的编辑我见的很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等等),许多老一辈编辑中,中青社如江晓天、吴小武、张羽都是这方面的模范。张羽这方面的事迹很多,我知之甚少。只知他到内蒙搞《王若飞在狱中》,安排他住高级宾馆,回来不能报销自掏腰包的事。还

听说过他多次自己掏腰包,请作者和来往的编辑、工作人员等吃饭。他为写《恽代英传》自费调查了大半个中国,这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得到的。

和张羽同志的接触中,他那难忘的笑脸,留给人的印象非常深,不笑不说话。他很谦虚,不强加于人,谈稿件的意见从来都是征询的口气。

我们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所有人对张羽同志的印象都非常好,叶一峰同志(丛刊组组长)曾赞不绝口:“张羽是难得的好编辑,他对文学,对编务,文字工夫都很令人佩服。”叶一峰同志是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1938年到解放区的,写过长篇,文字工夫、文学水平都不错,他称赞张羽,可见张羽之见长。宁干(编辑)也很佩服张羽的业务水平。还有肖野(也是作家、诗人)对张羽同志也很敬重。

2005年4月16日